

# 关于“燕行录”界定及收录范围之我见

漆永祥

**摘要:** 本文认为,“燕行录”当有“广义”与“狭义”之分,《燕行录全集》或将来整理新编之本,皆当以“狭义”燕行录为定,即“燕行录”为朝鲜使臣与随员或负有秘密使命的官员“出使中国的使行录”,而不是一般意义上“往来中国的纪行录”。一部书是否属“燕行录”,必须具备两个充分必要条件:就作者而言,必须是国王派遣的使臣或使团中的某个成员,个别是负有国王某种特殊使命的官员;就其所到之地而言,必须是到过中国,或者到过两国边境的中国境内。反过来说,不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,而只具备其中的某一个条件,都不能算做是“燕行录”。而《漂海录》、《皇华集》、《东槎录》、《候接录》之类的诗文,以及其他与中国相关之著述,皆不当混入“燕行录”之中,至多也只能作为《燕行录》的《附录》,缀于卷末。

**关键词:** 《燕行录全集》;“燕行录”界定;“燕行录”收录原则;目录学

**中图分类号:** K312.34

**文献标识码:** A

**文章编号:** 1009-1017(2010)05-0060-06

《燕行录》主要是朝鲜李氏王朝时期(1392—1910),朝鲜国王派往中国的使臣所撰写的使行录。在十年前人们对《燕行录》的研究基本上还是零星的,个别的,2001年由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主编的《燕行录全集》出版后,带动了《燕行录》研究的热潮,以韩国学术界为主,包括中国、日本等国学者,对《燕行录》的关注与研究明显增多,一门新兴的“燕行录学”正在形成之中。同时,对《全集》的收录标准与原则,也引起了学术界对“燕行录”概念与范围界定的争论。笔者在研读《全集》的过程中,也曾对此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,也曾两度访问林基中教授,并与他交换意见。现将笔者的一己之见论述如下,所谓抛砖引玉,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关于此问题的关注与讨论。

## 一、“燕行录”概念之界定与收录原则

笔者曾在《〈燕行录全集〉考误》一文中,就“燕行录”之概念有过论述:

《燕行录》,窃以为就广义而言,凡履迹及中国之朝鲜人所著书,皆可谓之“燕行录”也;若就狭义言之,则专以朝鲜国王遣往中国之使臣或随从所著之书,方可谓之“燕行录”耳。笔者以为,《燕行录全集》所收,当以狭义之“燕行录”为收录原则,

即凡非燕行使团中诸人所作者,皆不可谓之“燕行录”。否则,若崔致远《桂苑笔耕集》等书中,凡涉中国之诗文,皆谓之“燕行录”,则泛滥而无涯涘矣。<sup>①</sup>

上述说法,并不完备,但大致反映了笔者的看法。为什么要如此说?首先我们来看看“燕行录”三字当如何解释?

“燕行录”如果要再翻译成现代汉语,而且直译的话,那只能是“行往北京的纪录”,或者“往来北京的纪录”;如果意译宽泛的话,就是“往来中国的纪录”。但这两种翻译或理解,实际都是不准确的,都是为“燕行录”三个汉字的字面义所蒙蔽。

因为“燕行录”三字,有着其特殊的含义,在理解过程中不可不注意:“燕行录”既是一名作者一本书的专名,又是六百年来朝鲜使臣多人多家多种书的通称。也就是说,“燕行录”既是专名,又是通名。此书名从感情色彩上来讲,无褒无贬,客观而中性,也最为常见,为朝鲜后期与近现代乃至当代人所接受,所以才把使臣此类书籍统称为“燕行录”。把握住了这一特点,对“燕行录”的理解就不会仅仅停留在字面上。我们试分析之:

### 1. 与中国使臣所撰《奉使录》等相比照

虽然中国历代派往朝鲜的使臣,远没有朝鲜前

收稿日期: 2010-01

作者简介: 漆永祥(1965—),北京大学中文系,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教授。

<sup>①</sup>漆永祥《〈燕行录全集〉考误》,首尔: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编《中国学论丛》第24辑,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2008年版,第234—235页。

往中国的使臣那么多，但也流传下来一些中国使臣撰写的纪行录。例如宋代有徐兢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，明代有倪谦《奉使朝鲜倡和集》、《朝鲜纪事》，张宁《奉使录》，董越《朝鲜赋》、《朝鲜杂志》，龚用卿《使朝鲜录》，朱之藩《奉使朝鲜稿》，姜曰广《輶轩纪事》，清代有阿克敦《东游集》、《奉使图》，柏葭《奉使朝鲜驿程日记》，魁龄《东使纪事诗略》，马建忠《东行三录》，崇礼《奉使朝鲜日记》等书。如果像“燕行录”代指朝鲜六百年间使臣所撰之书名一样，用一个书名来概括的话，那么中国使臣的著作，可以用《奉使录》或《使朝鲜录》来代称。<sup>①</sup>而朝鲜使臣所撰《燕行录》，与中国使臣一来一往，一西一东，而书名从性质上讲其含义并没有不同，由此也可以比照推断，“燕行录”之“行”，与“奉使录”之“使”，字异而义同，皆为“使行”、“出使”之义，非一般意义上的“出行”、“行游”之义。所以“燕行录”实际即“奉使录”、“使行录”或“使燕录”，而不是泛指“往来北京的纪录”。在朝鲜末期所编《同文汇考补编》中，所收历年出使清朝的使行与官员名单，就称之为“使行录”。<sup>②</sup>

## 2. 与朝鲜使臣所撰各种“燕行录”相比照

前已述之，“燕行录”既是某一部书的专名，也是数百种朝鲜使臣著述的通称。<sup>③</sup>朝鲜王朝时期（1392—1910），差不多与中国的明朝（1368—1644）与清朝（1644—1911）相始终，如果将《燕行录》以明、清两代为分界而言的话，那么明朝可以用“朝天录”代称诸书，而清代则只能用“燕行录”来代称。在《燕行录全集》中，以“朝天录”为书名者约在45种以上，以“朝天日记”为名者14种以上。同类的还有赵翊《皇华日记》等<sup>④</sup>，也是此种有尊褒含义的书名。而《全集》中，以“燕行”（包括《燕行日记》、《燕行诗》、《燕行杂记》等）为书名的，更是多达150种以上，尤以清代为最。<sup>⑤</sup>其他书名，

有以燕行录作者所到之地取为书名者，如金宗一《沈阳日乘》、李昭汉《沈馆录》、申濡《沈馆录》、朴趾源《热河日记》、柳得恭《辽野车中杂咏》等。因从朝鲜王城往中国，大方向是北向再折西行，所以有部分“燕行录”的书名也是如此，如黄中允《西征日记》、郑太和《西行记》、金芝叟《西行录》等。又有作者为使书名古雅，多以“槎”为名，如黄汝一《银槎录》、全湜《槎行录》、李廷龟《东槎录》、李民宥《燕槎酬唱集》、申佐模《燕槎纪行》等，大多数并不是真正泛槎海路前往中国的。又有入清以后，使臣在不自愿的情形下出使“虏廷”，故为自己的书所取之名，含有行饮冰雪、包羞忍辱之义，如郑太和《饮冰录》、蔡济恭《含忍录》等。另外，还有其他各种书名，如金锡胄《捣椒录》、崔锡鼎《椒余录》、崔锡鼎《蕉回录》、金昌集《燕行坝箴录》、姜覬《看羊录》、李肇源《黄梁吟》、金景善《燕辕直指》等。

由此可见，作者为自己的使行录所取书名，是非常复杂而各具特色的。如果没有明、清易代，那么“朝天录”或许是此类书的最佳通用名，即“朝贡天朝的纪录”，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强调如此敬重尊崇中国，而是说这样的称谓从语义上所指准确，就是使臣所作纪行录，这样就不会出现因“燕行”二字宽泛并包，而导致目前学术界的各种争论了。

因此，笔者认为，“燕行录”概念的界定，就是“出使中国的纪行录”，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往来中国的纪行录”。笔者的观点是：一部书是否算是“燕行录”，必须具备两个充分必要条件：一是作者必须是由国王派遣的正式使臣，或是使团中的某个成员，或者是负有某种特殊使命的官员；二是作者必须到过中国（或者到过两国边境的中国境内）。反过来说，不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，只具备其中的某一个，都不能算做是“燕行录”。

## 二、哪类著述是“燕行录”？

明确界定了“燕行录”的概念之后，对于哪类著述是“燕行录”，哪类不是“燕行录”，什么书可以收录，什么书不可以收录，就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收录原则与标准了。笔者经过仔细鉴别与研究，认为在《燕行录全集》中，有些书虽然收了进来，也通常被认为是“燕行录”，但实际不是；有些书虽然没收，但当属“燕行录”，应该补入。

当时使臣的意愿。

①以上数种书，皆收入殷梦霞、于浩选编《使朝鲜录》（下）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。该书书名统诸种书而称之为“使朝鲜录”。

②《同文汇考补编》卷7，参《同文汇考》第2册第1700页；又见《燕行录全集》第27册。

③今《燕行录全集》所收计300余种，据林基中教授估计，目前可见者约500余种。

④赵翊《皇华日记》，见林基中主编《燕行录全集》第9册，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版。

⑤在《燕行录全集》中，有不少书籍原无书名，或者辑自诸家燕行使的《文集》中，所以部分“朝天录”、“燕行录”的书名，乃为编者所加，因此这一统计并不能绝对反映

## 1. 凡到南京、北京、沈阳等地出使者皆属“燕行录”

前已述之,《燕行录》的大量出现,是朝鲜李氏王朝时期,也是中国的明、清时期。明朝前期,首都在南京,明成祖时迁都北京(1421),清入关后亦定都北京(1644),对于朝鲜使臣到南京、北京出使的使行录,学术界无异议,以为皆属“燕行录”。但对于满清都沈阳(1625—1644)期间,朝鲜使臣前往沈阳的使行录,中国学术界认为应该算“燕行录”,而韩国、日本学术界则认为不算(林基中教授如是言)。笔者以为,凡到南京、北京、沈阳等地出使者皆为“燕行录”,这并不完全因为笔者是中国学者的缘故。试分析如下:

不认可出使沈阳的使臣所撰为“燕行录”,我想有三个理由:一是满州当时为另一国家或地区,不当纳入中国范围;二是当时明朝尚未灭亡,朝鲜在陆路与清廷虚与周旋,水路与明朝联系密切,臣事明朝而不服“胡虏”,且满州政权在正统思想下乃为“闰余”,不当认可;三是出使沈阳对朝鲜而言,乃清廷所迫,情非得已,故不能算为“燕行录”。

以上说法,看起来似乎有其道理。在《朝鲜王朝实录》中,对于明亡以前出使沈阳的使臣,亦有意阙而不书,曲为隐讳,直到明亡以后,才开始记录出使清朝使臣的姓名。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以上三种理由,就会发现都不能成立。

第一,所谓满州当为另一国家或地区,如果溯源导流,并不符合实际史实。清朝源于满州,初都沈阳,进而南下中原,据有全国,成为继明朝之后中国的又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,其正统性无可置疑,如果剔除其初都沈阳时期的朝鲜使行录,从出使北京算起,则有流而无源,难以真实反映朝、清两国间的政治与外交历史。第二,虽然当时朝鲜迫于形势,采取“双线”外交,但无论如何,都是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,不应该取一而弃一。至于认为满州政权乃“闰余”,更不值一提。第三,如果说朝鲜出使沈阳,乃清廷所迫,情非所愿,这的确是事实。但朝鲜王朝与清廷交往的过程中,可以说在中国乾隆中期以前,朝鲜对清廷都是反感与抵触的,直到乾隆中后期才不再称清朝为“虏廷”,不再称清帝为“胡皇”,那么是不是将清入关后的百余年朝鲜使臣的纪行录,也剔除在“燕行录”之外呢?

另外,如果出使沈阳的使臣诗文不算“燕行

录”,还会出现连锁反映,产生前后矛盾的现象。例如,清廷入主中原以后,朝鲜出使沈阳的使臣诗文,算不算是“燕行录”?如乾隆十九年(1754),清高宗奉皇太后巡幸盛京,朝鲜英祖遣判中枢俞拓基为问安使赴沈阳问安,俞氏著有《沈行录》<sup>①</sup>。又如朝鲜英祖四十年(1764)春,义州奸民于栅门外戕杀清朝甲军,清朝自沈阳移咨要解诸罪犯入送盛京,时朝鲜以金钟正为参核使出使沈阳,金氏此行着有《沈阳日记》<sup>②</sup>。又朝鲜正祖二年(1778),乾隆帝东行,正祖以领中枢李潏为问安使出使沈阳,随行之柳得恭著有《沈行录》<sup>③</sup>。又乾隆四十八年(1783),清高宗东巡,朝鲜派右议政李福源为问安使出使沈阳,福源从子田秀以“伴倘闲良”陪行,着有《入沈记》<sup>④</sup>。又道光九年(1829),道光帝西谒沈陵,朝鲜纯祖判判中枢李相璜为问安使、兼掌令朴来谦为书状官赴沈阳问安,来谦着有《沈槎日记》<sup>⑤</sup>。如果清初出使沈阳的使臣所著不计入“燕行录”,那么前举诸家之书,又该如何处理呢?

因此,笔者以为,《燕行录全集》所收如李景稷(原误作李景严)《赴沈日记》、金宗一《沈阳日乘》、李昭汉《沈馆录》、申濡《沈馆录》、未详《昭显沈阳日记》、许遂(原题未详)《沈阳日记钞》、未详《沈阳日记》等,自然当属于“燕行录”。就是未收如金尚宪《清阴集》中《雪窖集》、《雪窖后集》、《雪窖别集》,崔鸣吉《迟川集》中《北扉酬唱集》、《北扉酬唱录续稿》,曹汉英《晦谷集》中《雪窖录》等,并当入“燕行录”中,如此才能完整保留这段朝鲜王朝历史上屈辱的使行记录,供后人研究与反思。删而不录,反而使历史真像湮没无闻,岂不惜哉!

## 2. 燕行使所撰“状启”、“别单”与“闻见事件”等,皆属“燕行录”

从《燕行录全集》目前收录的著作来看,就文章体裁而言,可以说是形式多样,众体皆备,最主要的体裁为日记与诗歌(包括赆行诗)。另外有杂记、手谈草本、状启、别单、闻见事件、别曲、题跋、路程记、地图等。

据林基中教授称,韩国史学界以为,“状启”、别单与“闻见事件”类史料因为常见,不必收入

①俞拓基《沈行录》,见《燕行录全集》第38册。

②金钟正《沈阳日记》,见《燕行录全集》第41册。

③柳得恭《沈行录》,见《燕行录全集》第60册。

④李田秀《入沈记》,见《燕行录全集》第30册。编辑者以作者为“李宜万”,误。

⑤朴来谦《沈槎日记》,见《燕行录全集》第69册。

“燕行录”中。笔者则以为，此类体裁的文字，不仅可以算“燕行录”，而且是“燕行录”中堪称珍贵的史料，因为它们可谓是真正的“对中国的侦察与纪录”，是国王派遣使臣的重要目的之一，也是当时“燕行录”中最受重视与关切的部分，这些文字对朝鲜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与外交都有着深切的影响。

“状启”是燕行使速递给国王的使行报告，在往来沿途如义州、鸭绿江、栅门、沈阳、山海关、北京诸地，皆有状启提前专人呈送，归国以后书状官还呈送一份较为完整的“状启”，一般都是以简略的日记形式写成，供国王了解使行的情况。而“别单”与“闻见事件”则主要是依据中国当时的朝廷邸报、官方消息、大臣私语、民间传言以及使臣亲自观察所得，向国王上呈的秘密报告。“状启”与“闻见事件”所记内容，兼有窥探中国国情的间谍性质，因此属绝密材料，绝不能使中国方面知悉。若秘密重大事件，或者托中国商人与使臣代为呈递国王者，有时还会用“谚文”书写，以防泄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些文字恰恰能反映当时中国朝廷及民间的各种情形，对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是难得的史料，这些史料虽然在韩国是寻常易见之物，而在中国史籍中反而记录很少，甚至无有纪录，对于中国及其他国家学者而言，获读就相当不易。同时，朝鲜君臣也正是在如此侦察与了解中国的基础上，对其政治与外交等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，所以对研究当时朝鲜王朝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。如果将这一部分史料从“燕行录”中剔除，那就谈不上“燕行录全集”之名，其损失自不待言。

因此，除了《全集》已收的《燕中见闻》（编者未详）等外，如《同文汇考补编》所收诸家《状启》与《闻见事件》等，并当收入<sup>①</sup>。

### 3. 因国境或会谈等问题至中国之纪行录，也属“燕行录”

据林基中教授所言，韩国史学界以为，凡是因朝、中两国边界问题而出使的使臣，以及朝鲜末期到中国会谈的外交人员，他们所创作的诗文或日记，不当计入“燕行录”，笔者则以为，此类皆可算做“燕行录”。例如《燕行录全集》所收金允植《天

津谭草》与鱼允中《西征录》等<sup>②</sup>。《天津谭草》是金氏于高宗十八年（1881）以领选使身份前往天津，与李鸿章等中国官员商谈朝鲜与美国签约诸事；鱼允中则是以问议官的身份，次年与金允植一同在天津草拟了《韩中商民水陆贸易章程》等。虽然与传统的“燕行录”相比，他们的身份特殊，使命也与常规意义上的进贡使臣不同，但仍然是国王派遣出使中国，并且记录了当时谈判的前后经过等，是朝鲜末期政治、经济与外交等方面的重要史料，计入“燕行录”中，是符合我们所定的“燕行录”收录原则的。也只有如此，“燕行录”才能起自丽末，终于鲜末，有始有终，完整齐全地反映一代王朝的政治史、经济史、外交史甚至兴衰史。

另外，还有部分当时的官员，受国王委派到建州等地，伺窥探“野人”（建卫满州）实情的闻见纪录，如《燕行录全集》所收申忠一《申忠一建州闻见录》<sup>③</sup>，虽然不是正式的使臣，但负有特殊使命，也可以算做“燕行录”。他如《全集》未收之李民宪《紫岩集》中所录《栅中日记》、《建州闻见录》、《越江后追录》等，是在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，李氏随元帅姜弘立等入满州前后所记见闻<sup>④</sup>，此类亦可适当放宽收录为宜。

## 三、哪类著述不是“燕行录”？

### 1. 《漂海录》一类著述不是“燕行录”

在《燕行录全集》中，收录有崔溥《漂海录》与李邦翼《漂海歌》（谚文本）<sup>⑤</sup>，如果按前述“燕行录”之收录条件，则此二种书的作者，既不是使臣或随行人员，更不负有国王的特殊使命，而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外力，为恶劣天气所致，在惊涛大浪中，九死一生地漂流到了中国。因此，虽然他们也写有日记与别曲，但皆不能算是“燕行录”。

崔溥的《漂海录》，可以说是名著，此书在韩国、中国与日本等国，研究者与研究成果颇为丰富，有着“东方的马可波罗游记”之称。因此，不收入《燕行录全集》，韩国学术界觉得可惜，但将其计入“燕行录”，的确属于勉强。因为在《全集》中，类似之作只有两种，所以割爱不收，也未尝不可，不会

<sup>①</sup> 见《同文汇考补编》卷1至卷6《闻见事件》，《同文汇考》第2册第1562—1700页；又《同文汇考补编续》，见《同文汇考》第4册第3762—3832页。

<sup>②</sup> 金允植《天津谭草》与鱼允中《西征录》，分别见《燕行录全集》第93、89册。

<sup>③</sup> 申忠一《申忠一建州闻见录》，见《燕行录全集》第8册。

<sup>④</sup> 李民宪《紫岩集》，见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82册。

<sup>⑤</sup> 崔溥《锦南漂海录》与《漂海录》，见《燕行录全集》第1册；李邦翼《漂海歌》，见第61册。

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
## 2. 与中国使臣唱和之作《皇华集》、《东槎录》等不是“燕行录”

明清两代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臣,明代多为宦官,到了朝鲜,只知贪黷索贿,辱国无耻;清代或遣满州武臣,粗通文墨,不解音律。这两种人,为朝鲜君臣所不喜,他们也没留下纪行的文字。但是在长达六百余年的交往史中,也有不少文人达士出使朝鲜,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及与朝鲜官员的唱和之作。如前述明代倪谦、张宁、董越、龚用卿、朱之藩、姜曰广等,都是进士出身。其中龚用卿、朱之藩为状元,董越为探花出身。他们都是文坛高手,精于诗词,且为人廉洁,不贪不占,如姜曰广在天启六年(1626)奉使朝鲜,“不携中国一物往,不取朝鲜一钱归,朝鲜人为立怀洁之碑”<sup>①</sup>。当这些使臣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后,朝鲜方面就会派远接使、迎慰使等一路迎接,而这些官员也都遴选当时朝鲜最具诗才的重臣担任。中国使臣自渡江后前往王京、在京出游以及回归伴送途中,与朝鲜陪从官员相酬唱角胜,双方都留下了大量的唱和诗作,有些还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。此类诗作,往往被编纂成集,如《皇华集》、《东槎录》、《宾接录》等。除了已经结集的朝鲜朝历代之《皇华集》外<sup>②</sup>,个人文集集中的此类诗作也非常之多。除《燕行录全集》所收如李廷龟《东槎录》外,未收者如申光汉《企斋集》卷8《东槎录》、卷11至12《皇华集》,郑惟吉《林塘遗稿》卷上《东槎录》、卷下《宾接录》,柳根《西垞集》卷4《皇华集》,车天辂《五山集续集》卷3《五七言杂录》,李晔光《芝峰集》卷14《皇华集次韵》,李昭汉《玄洲集》卷1《东槎录》等诗皆是。<sup>③</sup>

以上所举是荦荦大者,至于在诸家文集中零星数首和中国使臣之诗,更是多见。但笔者认为,此类诗文不属于“燕行录”,而应该算是相反方向来

的中国使臣之“使朝鲜录”的附属部分,应该自成一系,别具特色,而不当与“燕行录”混杂不别。

## 3. 与燕行有关然未出国境之人所撰者,不是“燕行录”

在《燕行录全集》所收录著述中,如权近《点马行录》<sup>④</sup>,共录诗35首。为权氏自王城至鸭绿江边,述点马过程与夫路途见闻,点马毕即返京复命。虽然权氏此次出差,事由为向中国进贡马事,但其人实未曾跨江到中国,故严格而言,不可谓之燕行录。又据林基中教授言,尚有梦游“燕行录”,或者凭想象所撰写之“燕行录”,此类亦不当收录,如果一定要收录,则可以做为《燕行录全集》之《附录》而收录,俾使泾渭分明,不致混淆相杂。

另外,如成海应《研经斋全集》卷33至34《丁未传信录》(记福建漂人事),卷35《南明书拟稿义例》(编纂南明历史事),卷36《风泉志》(记孝宗在沈馆时事),卷38《松锦记程》等(记明军与清军沈阳战役等事),卷40《康世爵避兵记》(明遗民康世爵避乱入朝鲜事)、《沈行记程》(崇祯八年李浚为春信使使沈阳事),卷50《建州录》、《建州纪程》(申忠一入建州事),卷52《周汉杂事》,卷53《唐制考》,卷65至69《燕中杂录》等,皆涉中国之事。<sup>⑤</sup>但都是在参考他人数据的基础上,类似于重新写定的史著,故不能算“燕行录”,尽管有《燕中杂录》这样的卷帙与内容,亦不当滥入为宜。

## 4. 一般为宦、旅行或因他事到中国之人所撰者,不属“燕行录”

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密切,尤其在高丽时期,以崔致远等为代表的文人学士,不仅到中国学习,而且高中进士,在中朝做官,又与中国士大夫文词往还,各有撰述,如崔致远《桂苑笔耕集》之类,所在多有,如果此类著述也算“燕行录”,或者将与中国相关之著述与诗文也算的话,就会收不胜收,泛滥无涯,所以不宜放得太宽。如《燕行录全集》中所收安孝镇《华行日记》<sup>⑥</sup>,为高丽朝儒学巨匠安裕之裔孙安孝镇,因深感西学浸淫,儒学衰微,故于1917年携《孔子编年》、《朱子年谱》、《安先生年谱》三书,与士人承一自王京前往中国

①《明史》卷274《姜曰广传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23册第7029页。

②《皇华集》全6册,首尔:国学资料院1993年版。

③案:此“东槎”指中国使臣自东而来,故名《东槎录》。另外,朝鲜使臣出使日本的诗作,因为是沿水路东向,故亦称《东槎集》。如赵絅《龙洲遗稿》卷23《东槎录》,尹顺之《涇溟斋诗集》卷3《岛岭次崔生韵》(己下癸未《东槎录》),申濡《竹堂集》卷2-3《海槎录》上下,金世濂《东溟集》卷4《槎上录》、卷9-10《海槎录》上下(日记),赵泰亿《谦斋集》卷4-6《东槎录》(上中下)等,皆是出使日本时所作诗歌与日记。

④权近《点马行录》,见《燕行录全集》第1册。

⑤详见成海应《研经斋全集》,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277-278册。

⑥安孝镇《华行日记》,见《燕行录全集》第99册。

山东曲阜，拜祭孔庙，谒见衍圣公孔令贻（燕庭）等，求其为所编诸书撰写序文等，以便归国后弘扬儒教。其时朝鲜已在日本铁骑践踏之下，孝镇之行，既非国王所差，亦非日皇所遣，故非“燕行录”可知，此类并当删去为妥。

#### 5. 因各种原因导致误收者，更不是“燕行录”

在《燕行录全集》中还有另一种情况，就是编辑者完全误收，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著述。如洪景海《随槎日记》<sup>①</sup>，乃英祖二十三年（1747）洪景海随父启禧出使日本时所记航海日记，非燕行日记，编辑者隶之《燕行录》中，大误。又如未详《西行录》，记载作者“自京抵安营凡七百二十里，并计往还则千有四百有四里也。发于十一月十九日，费二十三日，而还时则十二月一日也。”<sup>②</sup>书中不明确作者究竟是因何事北行，但不论是出公差还是私人行旅，其所记既与中国无关，又未跨出国境一步，所以也不当收入《燕行录全集》中。

### 四、结 语

总前所述，笔者认为，“燕行录”当有广义、狭义之分，《燕行录全集》或将来扩大整理的新编之本，皆当以狭义燕行录为界定，即“燕行录”为朝鲜使臣与随员，或负有秘密使命的官员“出使中国的纪行录”，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往来中国的纪

行录”。一部著述是否“燕行录”，就作者而言，必须是国王派遣的正式使臣或使团中的某个成员，个别作者是负有国王某种特殊使命的官员；就其所到之地而言，必须是到过中国，或者到过两国边境的中国境内。反过来说，不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，而只具备其中的某一个条件，都不能算做是“燕行录”。而在狭义燕行录范围内，则可以适当放宽收录原则，像“梦游燕行录”或“想象燕行录”之类，或与燕行录相关的赆行诗文与序跋等，可以做为“附录”，缀于全书之末。

另外，还有一种特殊情况，就是在元代既在元朝做官，又在高丽朝为宦的高丽官员所撰写的诗文，应该区别对待。他们在出使元朝期间所撰的文字，应该是“燕行录”；而在中原任职期间所撰纪行录，则不当视为“燕行录”，而应做为附录缀后，否则也容易引起混乱，好在此类作品为数不多而已。

他若《皇华集》、《东槎录》、《僊接录》等书，以及其他与中国相关之诗文，当另为编纂，不当混入“燕行录”之中。否则，笔者认为将会带来两种不良影响：一是庞杂无绪，无有标准，滥收无厌，多不胜收；一是使“燕行录”失去其自身独备的特性与优势，淹没在各种相关文字之中，不仅会给读者带来疑惑，而且会给“燕行录”的研究，也带来诸多纠结不清的问题。

（责任编辑：陈剑）

<sup>①</sup>洪景海《随槎日记》，见《燕行录全集》第59册。

<sup>②</sup>未详《西行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77册第394页。